

导论

李杏保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拥有并自尊而自豪地运用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都德的《最后一课》，以沉重的笔墨写下了韩麦尔先生“告别”语文课的几段撕心裂肺的话：

作为一个教母语的老师，面临的是要跟自己的语言分手，跟自己的祖国分手。这是何等难以忍受的悲痛！可是，我必须负责，必须振奋精神。当前，我还是一位教法语的老师，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有限的时间传授给学生无穷无尽的知识，我还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播下美好的种子！

……

怎么？你们还说自己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也不会说，不会写！

……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永记在心，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的钥匙。

……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有了语言和文字，就伴之而产生语言文字教育，这才保证了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中华五千年文明，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依存于中国语文教育合乎规律的发展。

我们虽然没有面临“告别语文”的“最后一课”。但是，我们不得不严肃地反躬自问：语文危机是否也正在向我们敲起警钟？

“怎么？我们还说自己是中国人呢，不少人连自己的话也说不好，自己的字也写不好，自己的文章也写不通！……”

概而诘之：“我们的语文教育怎么啦？”

回眸我国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非学科化的语文教育，早就融汇一体地存在于子史经集之类的综合教育之中。这样的旧式教育虽然也曾一度辉煌，它保存、传承着我国的文化国粹，不断培养出历代的爱国精英人才。然而，由于主宰文士命运的八股文、科举制的长期异化，旧式教育越来越背离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越来越成为文人学士的精神桎梏，越来越有悖于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强国教育宗旨。

一百多年前的戊戌维新人士们，其实，已经思索过类似我们今天教育所面临的某些问题。光绪皇帝在他下达的谕旨中明确声称：“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在奏折中迫切地写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余年后，人才始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他们果断地提出并步履艰辛地实施着一系列对策：废八股，停科举，兴新学，定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 1. 13），清政府终于批准并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拟制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当时新学堂的学制、课程以至教材，大都从东西方先进国家引进。唯有语言文字教育的独立设科，必须由我们自己的教育先驱们根据国情和母语特点来积极探索建设。尽管新学制初期仍是在强调儒家经典在整个教育中的特定地位，然而，中国文学一科毕竟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清醒地指明：“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又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

凡是有过射击经验的人，都懂得一个极为简明的道理：准星的瞄准点越逼近靶心，命中率就越高。“止贵明通”正是当年《学务纲要》向我们明示的中小学语言文字教育的“靶心”所在。至于如何认识、把握和练好语言文字这把“枪”，如何养成良好的练“枪”习惯，如何思考平时“练”枪和战时用“枪”的关系，如何在“射击”的全过程中保持良好心态与处理好关键要害

处的重要纽带，如何自觉地协调好训练与自练的关系，如是等等，远不是一篇《学务纲要》就可以概揽无遗的。早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我和扬州大学的顾黄初教授，就主编了一部自新学制实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语文教育论文集。尽力搜集了当年对语文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名家论述，按论文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出版，供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研讨参考。当时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审阅了这部书稿，亲自提言论集名称并亲笔题署封面为《二十世纪前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

弹指间，这部论集已问世20余年。数以千计语文教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从这部论文集中熟谙了许多本不该忽视的一代语文教育宗师，如：蔡元培、梁启超、蒋维乔、夏丏尊、吴研因、钱基博、黎锦熙、陶行知、胡适、陈鹤琴、孟宪承、王森然、阮真、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蒋伯潜等。这部“论集”和尔后编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李杏保 顾黄初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初版 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有幸成了教育学（语文方向）研究生们的重要文献和基本教材，不少高等师范院校还将这两部书列入对口“考研”的必读书目。每年有大量研究生和在职进修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求购“论集”，却因初版久已告罄而未得。作为主编之一，自然也为之惴惴不安。

前不久，教育部辖下语文出版社的几位编辑主动联系，希望我着手再版“论集”，以应时下各方之需。考虑到原主编之一的顾黄初教授已逝世多年，而“论集”中又确实还存在不少遗珠之憾与讹误之失，故而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较为重大的更动，竭力使其更具文献性、学术性、现实针对性，从而尽力使之升格为一部名实相副、蕴涵较为深广的“论典”。

二

当年，吕叔湘先生题写的书名《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大气恢宏；且又再三勸勉我等晚辈赶紧编就《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同时写下了十六个“后”字，以待“后期论集”出版时易署书名时备用。吕

先生果然未能亲睹“后期论集”出版而永别世寰。如今跨入二十一世纪已逾十余年，往后的“论集”又将如何赓续承编呢？沉思之余，只能将吕老的挚诚之深情永远铭记，而依本学科的历史定称作为分期根据，简洁明瞭地命名此编为《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并特邀顾黄初先生传人徐林祥教授和本人学生方有林博士并任主编，共襄其事。

“语文教育”这个特定学科名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正式启用的。自清末实施新学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如此漫长的时期，我国的语言文字教育学科名称，主要就是“国文”和“国语”；这一时期有着45年学科发展的丰赡文化积淀，而后，又有了60余年曲折反复历程的沉思反省，而今，正值纪念新学制独立设科11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国文”“国语”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可谓恰逢其时了！

既称《论典》，入典者，当为该时期一代宗师的经典宏论之作。有鉴于此，本典悉心补选了诸如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等拟订的《学务纲要》、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主讲的《国文阴阳刚柔大义》、现代学术奠基人之一王国维首倡的《论教育之宗旨》、现代书法教育泰斗沈尹默的《执笔五字法》、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吴承仕经学大师撰著的《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现代美学泰斗朱光潜先生著述的《文学与语文》等篇章。对“论集”原来编辑的当年一线优秀教师经验总结性文章，则节要附录于《论典》的相关大作之后，以为佐证或补充。

《论典》对“论集”中每篇所辑文章前的导读式小引，全部依据可靠资料和对文章研读之所得，予以重新改写。一是依据徐林祥教授提议，尽力补齐论文作者生卒年代与主要经历（暂无确证者，注明生卒年不详，以求赐教）；二是接受首都师大饶杰腾教授等严肃批评，竭力纠正其中事实与行文之谬误（如：将沈仲九误认为浙江一师“四大金刚”之李次九，等等。谨向广大读者致歉）；三是听从使用过“论集”的研究生们建议，力戒导读文字的浮汎空洞，主编要求读者参读文献，首先要自己逐字逐句认真进行研读，既便于中肯地写出阅读建议，也便于在对照阅读中力避排印中的讹误。本《论典》对

所选论述中重要的文句，采用了黑体加粗排印，以引起阅读时更为关注。用意如斯，妥否？尚祈指正。

至于全书之导论，尤当重视教学实践的检验，着重于对本《论典》的体例、特点、内容与用法，作出较为具体的阐述。因而，它与“论集”之导论相比，当然会面貌一新。

三

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这也是应该有一定条件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停止争论，有时候需要搁置争议，这些，都与一定的背景、环境及相应的主客观条件有关。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攸切相关。语文学科教育，常常会引发社会大讨论的轩然大波，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往往也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60多年来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政治倾向、非学科性和边缘化等方面有意无意的干扰，投入讨论者对祖国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不甚了然，各言其是，各论他非，于是乎就出现了“不讨论还清楚，越讨论越糊涂”的混沌局面。

“论集”的“导论”中，曾尽力去寻循清末新学制以来语言文字教育的行踪轨迹，概括为五大“分”“合”的路径。然而，“文”和“言”、“文”和“道”、“文”和“知”、“教”和“学”、“教”和“研”这五大矛盾的揭示，是否周延？是否精当？就很值得推敲。而在处理这一对对矛盾时，以“分”为宜？以“合”为宜？抑或“分”“合”交替、“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论集”中诸多论文作者未及明言，编者似乎也不宜越俎代庖。当初的阐述，未免诉诸现象者居多；意欲揭橥规律者，则显露力之不逮矣！

缘此，我们对入典的论者与宏论，由衷地萌生敬畏之心。眼下，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追睹他们远逝的背影，我们却不能不把他们还存留在一个多世纪的文献中的眷眷心声，尽量复原地呈献给我们的同辈和后辈。也许，像那45年的国文国语教育时期，风起云涌地出现一代宗师群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梦想再现这样的奇迹，需要自信与期待；方今之计，却更需要从我

们民族文化曾有过的辉煌中，汲取学科前辈们的卓越人生境界、睿智的学术胆识与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

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这部《论典》承载着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心悦诚服地铭记着，“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老师王森然先生，对我们情深意长的嘱咐：

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国文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改进？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王森然先生决不是一名排外主义者，他的理论著作在阐述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时，显然是参阅了国外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著述。如：杜威、孟禄等人来华调查后所作的重要报告，柯尔文的《中学教学法》、海沃德的《欣赏之教学》、桑代克的《教学之原理》、台尔和勃拉地合编的《文学选读》、裴柯和桑代克合编的《日用古文选》等。森然先生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旨在冲破我国旧式教育中不合理因素的桎梏，为了促使我国民族特色的国文教育构筑现代教育的基础而开辟新路。

我国现代教育的前驱宗师，大多是学贯中西、国文根柢深厚的俊杰英才。梁启超、唐文治、王国维、蔡元培、蒋维乔、胡适、黄炎培、钱基博、邵爽秋、刘半农、吕叔湘、林汉达、朱光潜等，都精通一国乃至多国外文；甚至连四十开外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徐特立，也努力通过了法文阅读和研究关。他们绝不以通晓外文而自矜，而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文化而不懈地开创着中国特色的国文国语教育道路。

这部《论典》，限于篇幅和我们才识的局限，难以全面展示前贤国士们对国文国语学科教育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下面，就学科宗旨任务、课程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研究、科学实验探讨、学科发展趋向等方面，联系《论典》所辑文献，试作简要的分析与提示。

（一）关于学科宗旨和任务

“宗旨”一词，在我们的教育语汇中已经久违了。“教学大纲”的提法，似乎也不合时宜了。其实，从语文学科的特点而言，过去也曾用过“目标”和“课程标准”的表述方式；而在实践的把握中，往往会失之于某些刻板、机械而程式化的操作，而疏离了语言文字习惯和能力养成过程中的生机与灵动，忽视了“止贵明通”、学以致用通才育成宗旨。一百多年前的《学务纲要》，其国文宗旨，顺应了时代发展形势，表述一除烦琐，意在更快、更多、更好、更实在地培养于国、于己均为有用的人才。

起草《学务纲要》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后来又成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创办人，他所拟定的教育宗旨，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平易近人。1922年，吴研因拟订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其“主旨”表述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如是云云；叶绍钧拟订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其“要旨”表述为“在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藉以较充分的练习运用文字的能力，并涵养文学趣味；由了解语体文，进而了解文体文，由浅及深，自成一圆周，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从实质考察，上述“宗旨”与“要旨”，无不是“止贵明通”的扩展与延伸。

时代发生了政治形势的巨变，然而，国文国语学科的基本宗旨还是有其延续性的。即使从空间与政治制度相异的中华国文国语教育而言，如果连学科的基本宗旨也迥然不同，那么，全球华人的华语交流，还有什么“明通”余地呢！

“按国文教授之作用，不外形式实质二端。形式以涵养能力，实质以陶冶心性。”“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虽然，形式实质自哲学一元论观之，本难判别。形式必附实质以行，实质必藉形式以显。”

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1919）中作如是观。如果把涵养能力的形式视为“文”，把陶冶心性的实质视为“道”，那么，“文”就是国文教授的“本”，而“道”则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当有各学科共同承担其育成之任务。

叶圣陶、朱自清先生态度更为明朗。他们在《国文教学》一书中直白地表述：“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训练。”“国文教学诚然是（精神训练）这方面的有关科目，但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科目。……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要的。”

这一时期，更有陈启天、蒋伯潜等专家学者，先后明确地把培养语言文字能力的基本任务定为本学科教育的“主目的”。这类识见几乎成了学界共识。

虽然，亦有穆济波等名家从社会学与大教育视角出发，提出“语文本身不是教育目的”，提醒人们更要重视“人的教育”。这种看似全然对立的持论，如果仔细拜读双方的全文，就会发现，“人”、“文”二者的联系与互补，双方的讨论越深入，就越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国文学科在学校教育中的共性任务和本学科教育的个性任务。还是德国大教育家赫尔巴特说得好：“没有脱离教育的教学，也没有脱离教学的教育。”只是从论理学和辩证法的范畴思考，国文学科的特定命名与性质，就表明了它的矛盾主要方面与主要倾向：舍弃或无视语言文字教育本身，凭空地进行所谓的“人的教育”，国文学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典论》完整地发表了穆济波的文章，也完整地发表了宋文翰、朱自清的文章，包含着对穆济波观点的批评，以供读者独立地全面思考。

（二）关于课程和教材建设

癸卯学制公布后，虽然明确了独立设置的各门学科，但是，就语言文字教育这门重要文化学科而言，它所相关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却是相当筚路蓝缕、步履维艰的。力主变法维新的人士，深悉皓首穷经、延误有用人才的痼弊，然而，他们并没有做好相应课程与教材的充分准备。一段时间内，“读经讲经”仍然成为新学堂的主要课程。《学务纲要》中，尽力为之规划了教授导向，指明：在初等小学堂“其要义亦宜少读浅解。《诗》、《书》、《易》三经文义虽多有古奥之处，亦甚有明显易解之处，缓其深奥者以待将来入高等学堂再习。”在高等小学堂，则规定“授经学者每日读经一点钟，挑背及讲解一点

钟，后每年同。”第一年，“《诗经》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兼讲解。”第二、三年，“《诗经》、《书经》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兼讲解。”第四年，“《书经》、《易经》每天约读一百二十字，兼讲解。”在中学堂文科，一、二、三、四年，日读《春秋·左传》约二百字，每周七小时。且特别指出，读性稍逊者，亦可读节本。第五年，则学《周礼》节训本。

当初，尚无“国文”学科名称，中小学堂笼而统之地称之为“中国文学”，与“讲经读经”同步开授，每周为七小时。下设“读书”“作文”“写字”之类课程，也有学堂设置“词章”“中国文字”“中国文辞”之类不一，未见有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大都为授课教师自编自用的讲义。

平心而论，清末的学部终于开始打破千百年来封建经义绝对统治教育的局面。紧接着“讲经读经”的逐步削弱、“国文”学科及其教材的横空出世，由此以降的中华后裔，更能精神饱满地把握好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语言文字工具，更有余力去接触现代文明的一系列先进学科，更能开阔眼见地去瞭望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空间的风云变幻。

用这样的历史眼光，去披览清末民初的早期《国文》教科书，我们不能不折服惊叹，浮想联翩！用这样的历史眼光，去拜读《论典》中蒋维乔、沈颐、范祥善等人的论文时，我们就不能不肃然起敬，油然而生愧怍！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熟悉这些名字，但在当年，他们都曾主编、编辑过我国早期的多种《国文》教材，与张元济、蔡元培等语文教育泰斗一样，为缔造“国文”学科作出过杰出贡献。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与举措，是统一中国的历史性辉煌功绩，其实，“国文”学科的诞生，也无愧为延续和弘扬这一历史功绩的中华民族现代伟大文化工程。

然而，我们的先辈又超越“书同文”的视野，而适时地展开了在全国实现“言文一致”“语同声”的宏伟构想，以进一步突破区域性隔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应而涌起的国语统一运动，值当其冲。

1917年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1919

年在教育部的附属机关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毫不含糊地表示：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

彼时，教育部体察情形，确认了两个议案。即于1920年1月先下训令将初小“国文”改为“语体文”，后又下修正令文将“国文”改为“国语”。其态度之果决，效率之迅捷，可圈可点。须知，当时国语统一的标准尚未拟制，而小学的国语教育已走到前面去带动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了。胡适对此极为赞赏，评价教育部的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本《论典》所辑录张一麀的《我之国语教育观》，也很值得向诸位推荐。张氏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期的教育总长，官居高位，却不打官腔，文风如话。用如此语体文，表达了关于如何编著和使用《国文》、《国语》教材的论文，《论典》中选辑甚多，殊难一一详介。值得注意的是，周予同教授所撰的《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学界悉知周氏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其实，他早年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也与不少语文教育名家合作主编过好几套《国文》、《国语》教材。1922年，为配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制订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之需，周先生组织了一次隆重的专家讨论。这篇《建议》便是在讨论会上发表的。上海有几位参与编写语文新教材的朋友，偶而读到了当时载于《论集》的这篇文章，爱不释手，甚而连连嗟叹：“早看到这篇文章就好啰！”

（三）关于教学方法研究

教学方法是各科教育都必须倾心关注的。采用适切的方法，可以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事半功倍；方法不对，有可能事倍功半，乃至前功尽弃。近年来，学界十分强调教育效率。可是，往往未见有较为显著的成效。对此，

我们又常常简单化地一概归咎于教育理念或教学模式之类问题，这其实是不客观也不甚公允的。徐特立先生曾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中说过：“当科学萌芽时代，老八股和新八股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德国最不行的博士、大学生都创造体系，好像雨后春笋的发展。有些人以为科学的自由，就是在于有权著述一切自己所没有学习过的东西。杜林先生正是这种假科学的标本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中生搬硬套“洋八股”而肇致的教训还少吗？走中国语文教育的路，偏偏不相信中国自己的“脚”，硬是要“削足”去“就”他人之“履”，当今中国的教育界不也是有着“杜林”的影子吗？

教亦多术矣（叶圣陶语），国文国语的“学术”，应该多元地包括“学理”“法术”。《论典》中展示了琳琅满目的教学方法精粹，都是我们应该尊敬的前驱们乐于金针度人的无私奉献。对此，我们希望有志于薪火传承的青年同路者，循其法路，明其法旨，晓其法理，顺其法势，择其法善，走出一条条中国特色的母语教育康庄大道。

（四）关于科学实验探讨

环视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称之为实验学校的几乎已是遍地开花。不知道有多少确实改变教育面貌的实验成果，是经过严格验收，通过正常渠道，向一般学校和莘莘学子推广普及的。据悉，有些提高作文成绩的妙法，可以确保学生在短期内掌握，进而在高考、中考中赢得高分，顺利地考入理想的学校。其中，不少考生还能轻松夺魁，成了当地高考或中考的状元。有的媒体还声称该成果经过多年实验，成效显著，是国家级的规划项目。我们无意去质疑这些实验成果的实效，但我们有权问责主管部门：这类实验的教育目标究竟是什么？需要分享国家级项目成果者，不管本人任何基础条件，也不必考虑其他任何相关因素，付出千把元人民币，买下一本书加上几张光盘，就大事了结，这样的“实验结果”，是教育公平论倡导者和教育产业化抵制者们所能容忍的吗？再思忖一下，这样的实验，果真合乎教育规律吗？

《论典》让我们看到了过往不少“国文”“国语”大师和老师们，在教学

条件和生活环境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然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认真进行着一系列有益于促进事业发展的实验。

《论典》中介绍的姚铭恩、吴震春，都是第一线的小学国文教员。姚铭恩的《小学作文教授法》，是1915年发表于权威性《教育杂志》的一篇应征论文，堪为办新学以来一部完整的早期小学教授法教材。在“五四”以前，作为一名苏北县城的小学教员，还不可能有自觉的科学实验意识及完整的实施部署与方案。不过，细细研读姚老师的论文，不难发现他确实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并且努力提炼为有相当水平的规律性理论概括。他所谓的“尝譬作文教授，如保姆事业”，恰与叶圣陶先生所主张的“导儿学步法”，异曲同工。吴震春先生的《作文指导方法之比较实验》，1935年发表于《教育杂志》。两者相距二十年，教育实验的意识与相应举措有了长足的进步。两相比较，一目了然。其功之伟，何须置喙。

1934年《中华教育界》发表了署名为祝世德的国文教师的大作《初中国文教学经验谈》，作者所关注的是编写教科书问题。文章没有写作者本人进行过什么实验，但是，发出了令当今教材编写者都不免为之震撼的呐喊：“我们该觉悟了，高谈学理的空洞议论是不对的！我们要的是实验！我们要的是实验后的教材，实验后的教学法！我们要的是实验后的教训，失败的和成功的！所以学理是可贵的，经验尤其可贵！”

诚然，失败的教训也是可贵的。

1923年，中国公学中学部校务主持人舒新城先生，应我国现代实验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廖世承先生所邀，赴东南大学附中进行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对比实验。该项教育制度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中学创建的。其主要特征是：（1）以“实验室”或“工作室”取代班级授课制；（2）以学生兴趣自由支配学习时间，无所谓入学时间、进度和升留级等问题，（3）实行学分制。我国“国文”教育名师沈仲九、孙俪工、穆济波等先后亲身投入这项实验。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察觉了这项制度的不少要害问题，兼以设备条件要求过高，不适合我国国情，于是，坦承“道

尔顿制在文科教学方面的效果并不比非道尔顿制的班级更好。”他们宣布了并未成功的教学实验，也许为后世的教育改革者提供了更为有益的启示。

（五）关于学科发展趋向

这部《论典》的重要意义不限于典藏，而更在于“引”“据”；不只着眼于今天，也可放眼于明天和后天。昨天，“国文”“国语”教育平台，沟通的何止是几代人穿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今天，我们的“语文”教育平台，面临科技文明迅猛进步、人类文化迫切需要多元交流与发展的信息时代，怎样才能永葆光华、无愧五千年民族文化精神的积聚呢？尤其值得未雨绸缪、身居思考。

如果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审视这部《论典》，必将感感慨万千：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全国上下都揪心地盯着一个“钱学森之问”。请问：在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的语文教育领域，我们关心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吗？我们好不容易盼来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说，却与现代语文教育并不相干。幸好，《论典》中，就选录了不少教育名家明明白白的预言。

蔡元培先生在《国文之将来》（1919）的中指出：“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的境遇，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读能写，哪能叫人人都费那么多时间呢？”

胡适则在《中学的国文教授》（1920）中，充分肯定了民国元年《中学校令施行细则》之第三条：“国文要肯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胡适身体力行，1939年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这篇大作与刘半农的《应用文教授》等，都入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连当时还在小学任教“国文”的叶圣陶，都自觉地把一般的经验创造，积极地提升至理论层面。他与王伯祥合著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1919），声称“篇中多为平易朴实之理论，少陈类似教案之方法”。进而阐述道：“盖理论乃根本，乃原则，根本定，原则立，自能左右逢源，自由肆

应。”

“国文”“国语”教育理论建设及其学科发展，不能不感谢相关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名家们的鼎力相助、踊跃参与。《论典》中，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的《初中学生学习国文底旨趣》，中国教育史专家陈东原的《国文学习法》，《中国教育大辞书》主编朱经农的《对于初中课程的讨论·国语科的内容》，教育统计学专家邵爽秋的《科学化的国文教授法》，著名现代教育理论家孟宪承的《初中国文之教学》，教育心理学家龚启昌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之检讨》等等，无不在相当程度上辉映出学科现代体系建设的光彩。

从“国文”“国语”到“语文”，本该是学科大有作为的发展新时期。遗憾的是，屡屡出现周所众知的一系列干扰，迫使语文在其教学本身应有的“轨道”上无法“软着陆”；“假大空不绝，新八股孳生”，语文生态环境遭受了罕见的干扰乃至污染。对此，我们不能不呼吁全国上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关乎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振兴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语文学科教育，已经到了比“钱学森之问”更应该过问的时候了！

我们自知，由于多种因素所限，无力去轰轰烈烈地完成任何一项大事业。我们有缘并有幸，长期接触到一代宗师们有关语文学科教育的大量珍贵文献，收获良多。我们越来越沉重地感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竭力传递好这支“接力棒”——这支辉耀学科发展光彩的“火炬”。

毋须讳言，学科教育发展的道路依然会有艰难险阻。年轻人还须高擎中华文化复兴的“明灯”，抡起深化改革的“利斧”，披荆斩棘，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理论奠基人黎锦熙，从上一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直坚持不懈地草拟、制订、修改着关于“语法”、“读法”和“作法”的种种“新案”与“改革案”。因而，他所主持、领导的北师大及国文系，长期成了我国语文学科教育研究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也许还未被熟知或被淡忘的阮真先生，早在1929年，就成了我国“国文”学科教育方向的第一位研究生

导师。他在 1929 年前后的短期内，先后完成了《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中学作文题目研究》、《中学国文校外阅读研究》、《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研究》、《中学读文教学研究》等专著。正是有了如此厚实而充分的前期准备，他于 1936 年完成的《中学国文教学法》，自成严整的科学体系，对整个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作出了不可限量的贡献。

黎、阮等前辈的精神世界，必将为我们学科教育的深化改革，提供无坚不克的正能量！